

40

K092
G670

顾颉刚

撰

当代中国史学

蓬

王明佳 导读

莱

阁

从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史学 / 顾颉刚撰.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
(蓬莱阁)

ISBN 7—5325—2867—7

I. 当... II. 顾... III. 史学史—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559 号

蓬莱阁丛书

当代中国史学

顾颉刚 撰

王晴佳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5 印张 5.5 字数 124,000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5325—2867—7

K·380 定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有“汉家石渠阁,老氏蓬莱山”之称,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

《当代中国史学》导读

王晴佳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顾氏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实在是弥足珍贵的。本文既然是导读,作品与作者应是行文的重点;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戏谑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多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

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

谋求教职。^① 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海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② 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名声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介绍顾颉刚、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并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译成了英文出版,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代表。^③ 恒慕义的做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④ 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

① 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罗在回国以前致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② 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③ 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 J. B. Brill, 1931)。

④ 施耐德的书见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显赫,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关,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描述,此不赘言。中国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如刘起钎的《顾颉刚学述》、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①

以下结合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就几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内容特色加以分析。

一、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

^① 刘起钎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汎森的书1987年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吴素乐的则见 *Zweifel am Altertum: Gu Jiegang und die Discussion über Chinas alte Geschichte als Konsequenz der "Neuen Kulturbewegung"* ca. 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顾颉刚的这种文风和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莫大的喜事,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对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有极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篇幅不大,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但是,他的文风性格,还是有所体现。他所用的评语,非常直接、干脆,没有保留。他有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现了他直率、真诚的个性。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做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

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

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二十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也有不少有益的成分,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

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顾昔日的好友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① 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二、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

^① 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携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① 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携,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 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② 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

① 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② 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大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当时人面对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做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

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做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①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晗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及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说)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

① 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三、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

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

^①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他者”。在这一“他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他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沈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二十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